

GUANXI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江村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

[英] 常向群 著
毛明华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江村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

[英] 常向群 著
毛明华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常向群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 江村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 / (英) 常向群著; 毛明华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05-06707-6

I. ①关… II. ①常… ②毛… III. ①人间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6454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5\frac{3}{4}$

插 页: 2

字 数: 540 千字

印 数: 1—1000

出版时间: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放 李顺英 阎伟萍

封面设计: 杨 勇 白 咏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侯俊华

书 号: ISBN 978-7-205-06707-6

定 价: 68.00 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发展的模式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科学诸多学科所共同关注的热点。常向群的著作《关系抑或礼尚往来？》可以说是体现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虚拟标识”。这部优秀的著作是作者经过中西方跨学科的学术训练，基于当代中国的、长期的和深度的经验研究成果，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华人学者全面系统地挑战西方社会人类学的社会交换和互惠等重要理论的力作。

——邓正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版）主编

“礼尚—往来”模型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型，可以作为理解和解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钥匙。此书体现了常向群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在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1992）之后，常向群基于深度的经验研究和近20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呈现给我们一部高质量的足以载入史册的著作。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此书在中国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制造”从物质领域走向了文化领域，更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产品“走出去”时代的到来。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自1990年初结识常向群以来，我发现她是我所认识的中青年学者中为学最执著的一位。本书是人类学领域将经典的互惠理论与较新的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等理论联系起来研究的开拓性论著。基于对以往的经验研究的再研究和互惠理论的再思考，这项优秀的研究带有“反思的继承”的特点。该书基于长期的实地研究和对田野方法与理论的不间断追问，展现了作者的研究风范，它对于国内学者会有重要启发，对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重要价值。该书在运用传统中国的本土概念的同时吸收了国外学术理论资源，在超越“关系”的平面论述的研究上，将其置于社会过程中作动态的研究，并从历史的观念体系中寻找解释资源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试。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人类学评论》创刊主编

基于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并极为详尽的资料，常向群呈现给读者一部“特殊性与普遍性并存、社会性赠送与非人格化交换相随”现象的民族志。作者首次将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报”、“面子”、“人情”、“关系”等看似松散的主题词用“往来”的类型和“礼尚”的原则糅合在一起并展示其运作的机制。作者的贡献还在于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创造的动态性以及如何受享这种创造性。作者还在吸收了马歇尔·萨林斯关于互惠和非人格关系经典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作了拓展，并在展示其运作动态性的同时赋予了其活力。基于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政治经济状况的村落研究，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条件不同、风俗习惯各异，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经济向个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延伸不仅在局部地区可见，实际上无处不在。

——[英]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前全英中国研究协会(BACS)主席(摘自为本书所作的《序》)

基于广泛详尽的经验研究，常向群的《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的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一书展示了极为宝贵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全貌，并提出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宏大理论框架，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都将会大受其益。

——[英] 石瑞(Charles Stafford)，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

常向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关于中国农村的核心社会关系问题的深度分析。建立在费孝通开创的研究的基础上，她的江村研究在探查人类心脏的问题时保持了强烈的历史感。在调研中通过对中国情感和道德因素的特别关注，作者提供了一幅信息量丰富的和具有创意的普通农民生活的巨幅画卷。这份优秀的民族志正是人类学所应该做的。

——[美] William Jankowiak，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LV)人类学系教授

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最具动态性研究文献中的一项重要贡献。基于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多义且重要的“礼尚往来”一词，常向群从中国农村的研究中提炼出了一个精密的、囊括了通常分别讨论的诸如面子、互惠或关系等现象的、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框架。应用这个框架，本书诠释了在费孝通研究过的地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透彻和敏感的社会生活的民族志，既强调其连续性也表现其变化性。本书将成为试图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所有的社会学者重要的必读书。

——[英] Norman Stockman，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博士、全英中国研究协会(BACS) 总秘书长

序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广义的人际关系，作者注）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和中国人类学的主要特点。费孝通曾对东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做过这样的比喻：西方的个体是从属于不同群体的单个人（像被捆在一把柴里的一根柴即团体格局，译者注），而中国的每一个个体则是一个扩散的、互惠性的、有等级关系的、多级圈里的中心点（像一个石头扔入池塘里推出的波纹即差序格局，译者注）。此后，大量的学者，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等，都在不断地考证研究并精心阐述以道德哲学和中国社会关系及其特点为核心的主题词。

与此同时，关于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家，尤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和马塞尔·莫斯等人的观点受到质疑和修正。如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的演变是从特殊性关系走向普遍性关系的理论，莫斯的社会变迁是从总体礼俗性社会让位于非人格化的、以金钱为媒介的交换性社会的理论。他们这种关于变迁的两分法如今已经变成了同时并存的二元论，比如，特殊性将与普遍性并存，社会性赠送则与非人格化交换相随。

本书基于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和极为详尽的民族志将上述二者并存的现象呈现给读者。我想以民族志为基础结合先前的研究及相关理论逐项介绍作者的主要贡献。

“礼尚往来”是一个综合了实践和原则的短语。它以前被其他人作为儒学范畴来讨论，同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常向群用“礼尚—往来”概念把以往是单项讨论的几个主题词糅合在一起，比如关于“报”的社会哲学（非对称互惠）、“面子”和“脸面”的核心重要性、“人情”的道德经济（作为人类亲情关系），以及构建“关系网”的艺术（社会网络），等等。她展示出这些看似松散的主题是怎样结合在一起并如何运作的。作者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互惠关系的理论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创造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理性、感情、道德和宗教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工具性、表达性、否定性和馈赠性四种关系类型。这初看起来像是类型学，但它绝非仅此而已。因为作者向我们揭示一种关系如何转化成另一种关系，以及多项原则如何在同一关系中同时被使用。事实上，在吸收马歇尔·萨林斯关于互惠和非人格关系经典分析框架基础上，常向群拓展了这一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框架，展示了其运作的动态性并赋予了其活力，表明它应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张地图，社会距离和亲密性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方式，而非一个固定和预设的结构。

这项研究把我引向民族志的基础分析。是什么赋予了它活力？又是什么使它呈现出一个动态过程？答案就是人们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常向群写出了一部关于一个村的最翔实的民族志，同样是在这个村，费孝通曾在1936年为写他的博士论文做过田野调查。作者从1996年开始最初的田野工作到现在，一直和村民们保持着联系。通过与村民们密切而持续的联系，作者展示了村民怎样成为他们自己的智囊团，以及他们如何思考并乐于创造、改变和终止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与此同时，作者不仅展现了风俗的内容、人们如何习得在不同场合送不同的礼的规矩，而且还揭示出村民们如何调整、改变风俗习惯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不断变化的经济。村民们享受这些分门别类的创造，他们与本书作者用她的分析框架对他们所作的描述相符。村民们享受这种由于不断变化的形势迫使他们不断地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过程。这种对创造性的享受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创造的动态性是常向群对互惠理论民族志所做的两个主要贡献。

这本民族志是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非常具有动态性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设置(social setting)。常向群立足于变化的事实，尤其是不断变化的地方政治经济情况。在作者开展田野工作的那些年里，村级行政和镇政府变更过好几次，她对村民如何个人化和道德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有助于对这些变化的理解。这是一部既系非常繁荣中国的一部分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的一个村庄的微观史。如，它有比中国其他地方更注重诸如“小兄弟、小妹妹”亲情的习俗。尽管这是一项个案研究，但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中国各地区经济条件不同、风俗习惯各异，但人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随着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而减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经济向个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延伸不仅在局部地区可见，而且无处不在。

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 王斯福

2008年2月26日

前 言

本书通过探讨自1979年以来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社会支持安排,研究了村民们个人化的关系 (personalised relationships) 和互惠状况,包括个人之间的和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 (personalise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见第九章第一节之二)。试图将“礼尚往来”(li shang wanglai) 这个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短语发展为一个称为“礼尚-往来”(lishang-wanglai)^①的概念工具 (concept), 进而贡献于世界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从而实现在西方的这两个学科的教科书中没有来自对中国的相关内容研究的零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礼尚-往来”有助于理解社会人类学家华生(又译屈佑天)在研究中国的丧葬习俗时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使中国社会聚合在一起”(“What holds Chinese society together?” — James L. Watson, 1988, 第3页)。

前言部分,将首先介绍研究起点,即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资助关于“社会支持”的项目及其有关背景知识。然后借用田野作业时一位农民所使用的“礼尚往来”一词导入此概念。在解释了田野作业的一般方法之后,将界定研究的时空范畴以及作者作为研究者的独立和多面的学术立场。最后一小节将简要介绍本书的资料(田野记录与照片)的安排及其组织架构。此书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将对江村的经济、行政体制沿革、非正式系统等作一个全面的介绍;第二部分将叙述村民的“礼尚-往来”实践;第三部分则将探讨“礼尚-往来”这一理论模型的建构及其对于研究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的重大意义。

一、关于社会支持的ESRC项目

研究个人化关系的最初想法来自于题为“中国农村社会支持安排以及地方传统的

^① “礼尚-往来”的拼音形式 li shang wanglai 出自《汉英字典》(1995年修订版)第598页。它不同于石瑞对“礼尚往来”的用法 li shang wang lai (Stafford 1995, 2000a/c), 也不同于我在田野作业中所描述和分析时所用的 lishang-wanglai (见前言中“礼尚往来的民间用法”和第十一章第一节)。请特别注意,在中文表达上,与英文相对应,我中间也用了连字符,即“礼尚-往来”,以区别其他所有的关于“礼尚往来”的用法。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转型（1979—1991）”的 ESRC 项目（1991—1994）^①。在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系统建立之前，社会支持一直是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人寻求帮助的基本方式（见第九章第二节）。在我们的项目展开期间，中国有大约 80% 人口是农民，他们还没有被囊括进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所以我们以此作为切入点，以社会支持为工具来描述和分析中国农民如何通过互相帮助来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对于西方人来说，社会保障意味着政府将保障失业者、病患者、残疾人的基本生活。而在中国，城市和农村拥有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在城市里实行高就业、高福利、低收入政策，这意味着几乎每个城市居民在就业年龄范围内基本上都有一份能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工作。就业者的医疗、养老、住房甚至于家具，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和奖金都由所在的单位提供。换言之，城市居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单位高度相关。90 年代以后，这种高就业福利体系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不过这并不在本项研究关注之列。

在农村地区，则存在另外一种社会保障系统，即救助制度。救助制度包括国家救济和群众自助，它建立在个人有困难靠集体、集体有困难靠国家的政策基础之上（曹，1991）。换言之，集体在农民和国家之间扮演了获取和分配有限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资源这一角色。然而，表 0-1 显示国家所提供給农民的社会保障资源非常有限。截至 1990 年，只有 0.83% 的农民被囊括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国家统计局，1991），这一数据包括了重大自然灾害救济、扶贫以及针对五保户^②和特困户的救助。因此，只有上述提及的特殊困难农民才能得到政府福利系统的照顾，而大多数农民则通过社会支持体系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是在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里，而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生活则以家庭为基础。

表 0-1 1990 年社会保障覆盖面（百万）

	人口 *	社会保障覆盖面 **	%
城市	301.91	150	49.68
农村	841.42	7	0.83
汇总	1143.33	157	13.73

注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 年版。

** 曹桂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报告（四）”，见陆学艺、李培林著：《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3 页。

由于人民公社制的集体生产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在全国农村先后被废

^① 英国社会经济研究院（ESRC）（1991—1994），授权号 R000-23-2585。在 1991 年和 1992 年，7 位研究者（名字见“后记”）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访谈了 5 个省 10 个村庄的 304 户家庭，获得了大量文献、观察记录和问卷资料。这项研究在社会支持的领域里从内容到定义至今仍然领先（Chang & Feuchtwang, 1996, 第 56 页）。

^② 指对没有家庭支持的鳏寡老人实行吃、穿、住、医、葬服务。

除，村集体在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源分配方面的有限作用减少更多。至90年代中期，农村集体企业改制后，个体私营企业得到了发展，尽管集体的名义仍然存在，但是群众有困难已经很难依靠它了。在新世纪逐年加强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家庭担负起了重要的保障责任。然而，农民如何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及其他需要？又有哪些特殊事件需要大量花费而农民又是怎样安排的？ESRC的社会支持安排和当地传统的变迁的项目，采用社会支持视角对10个村庄从1979年到1991年的相关情况探讨了这些问题。

在我们关于社会支持研究开展的两年后，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增添了有关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的论述。于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①、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等（编委会，1995）。个人储蓄被定义为任何形式的金融储蓄或投资（多吉才让，1998），其中一种与社会支持有关的个人储蓄是养老金，是对“养儿防老”传统的重要补充。尽管有许多研究探讨农村养老保险，但这类养老储蓄与我们将要研究的农民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太大。在ESRC项目中，我们发现，只有大约10%的调查样本家庭有储蓄，而且只是少数的个人储蓄，因为他们的储蓄主要是储备建材和其他物资而不是存钱。

党和政府认识到，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实际上只涵盖了一个相当小的人口比例。这不仅因为有特殊困难的群众（例如五保户）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小，而且重大自然灾害在同一地区频繁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小。在农村推行社会支持的政策说明，党和政府鼓励农村绝大多数人利用不同的资源（例如家庭、邻里和朋友等互相帮助）自己照顾自己。虽然社会支持已经于1993年被列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但自那以后，除了一些关于城乡养老服务的政策研究或城市中职业女性的研究外，官方和学术界鲜有关于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②。

ESRC项目的假设是：非正式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网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的调研始于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通过亲属关系、婚姻关系、邻里、朋友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他们之间的互惠等所发挥的作用的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了更准确和有效地使用调查材料和数据，在统计报告中我们重新定义了社会支持概念（Chang & Feuchtwang, 1996）。

社会支持指的是人们通过自己所在的关系网中的以下四种方式之一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更多的社会需求：一、个人层面，作为互惠过程的一部分，个人或群体相互提供物力、财力、劳力、信息、技术、情感和其他资源；二、非个人层面，从

① 前四个项目早在1986年国家“七五”计划中就已经得到确认。

② 如，从社会学方面看：Hu Ruquan, 1986; Xia, 1988; Pan, 1992; Ruan et al., 1990 and 1997; Yuen-Tsang, 1997; Philip Olson, 1986; Kallgren, 1992; Sun and Sung, 1993; Wenger and Liu, 1998; Thomas Schweizer, 1991 and 1996; Bian Y. & Ang, S., 1997; Kimberley Manning, 1999; etc.。从社会人类学看：Fei, 1947; Hu Ruquan, 1986; Walder, 1986; Oi, 1986 and 1999; Deborah Davis, 1993; Selden, 1993; Unger, 1993; Yang, 1994; Yan, 1997; Cai et al., 1997; etc.。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政府获得贷款、津贴和好处；三、从保险公司获得的储蓄金（保险金）；四、通过其他市场交易，例如雇用劳力或支付专家咨询费用（1996，第4页）。

这是关于社会支持最宽泛的定义，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情境。不过在我们的调查中，社会支持的使用范围被缩小了。在统计报告中，我们根据以下标准进行了分类：一、社会支持的来源：自助、他助或公助；二、社会支持的内容：财力、劳力或信息；三、社会支持的事件：家庭事件、突发事件或投资事件；四、社会支持的范围：本村、本乡或乡镇之外。其中一些项目还被进一步细分，例如，他助分为亲戚、邻居和朋友，在朋友类型下又区分了七种不同类型的朋友。本书沿用了上述分类。

在ESRC项目中显示出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即开弦弓村（费孝通，1938；以下为“江村”）有74%的社会支持来自于“亲戚”^①（见第一章第三节）。这便是我将视线从10个村聚焦于这个村的原因，想要探讨为什么江村的“亲戚”或曰“姻亲”在社会支持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田野作业之后，我对从该村习得的“礼尚往来”这个中国的“社会支持”和“互惠”对应的概念尤为关注，因为它能够解释江村姻亲为何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而且它还提供了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支持运作的框架。因此，建立在对社会支持的田野作业和研究基础之上的“礼尚—往来”便成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我将在本书第二、三部分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上全方位地深入地讨论这一主题词。

二、礼尚往来的民间用法

把“礼尚—往来”（见第三部分）作为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受到我在田野作业过程中一位村民用法的启发。“礼尚往来”一词出自江村一位男性村民之口，另外一位妇女用“养猪”来表达同一意思（Chang, 1999, 第156—174页）。为了与民间俗语礼尚往来（*li shang wanglai*）相区别，我在本书中使用“礼尚—往来”（*lishang-wanglai*）特指社会支持和互惠研究中的一个专业术语。也就是说，尽管“礼尚往来”一词来自村民礼尚往来实践的文字表达，但“礼尚—往来”模型则是我对社会关系模式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基于它在江村隐含的特定文化模型。

1. 养猪

为了便于理解村民对礼尚往来的使用，我先将养猪的实践与礼尚往来的概念联系起来。“养猪”的比喻出自村里的一位老年妇女。她解释说，村里几乎每家都要养至少一头以上的猪。在1996年，养一头标准体重的猪一年要耗费猪饲料成本500元，而卖猪价约为600元至650元。显然，如果考虑猪饲料和劳动力付出，家庭饲养生猪的利润将会少于总支出。因此，人们不能指望从养猪本身赚到钱。但为什么村民仍然养猪？

^① 该村把亲属系统分为“自家人”和“亲戚”，我们概称为族亲和姻亲。前者指那些通过男性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拥有共同的祖先或后代的家庭，以及婚入的女性，但又不包括嫁出去的女性。后者是指那些通过女方联系起来的亲属，如在三代家庭之中，亲戚包括姑妈（是男性的嫁出的亲戚）、母亲的亲属、出嫁姐妹的亲属、妻子的亲属以及出嫁女儿的亲属。

村民告诉我，从养猪中获取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第一，猪的粪便积累了大量的农家肥；猪肉可为婚礼或丧事宴席所用；如果急需钱花时可以卖掉猪，马上换得现金。这些好处都被村民理性地考虑在内。第二，养猪与“养”的研究相关(Stafford, 1995; 2000a/c)。例如，一位村民说，有时候“养只大胖猪”与“养个大胖儿子”所带的感情色彩是挺相似的，因而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妇女在猪被杀掉时会流泪。第三，对村民来说，猪具有象征意义，家有一只大胖猪意指有福气。第四，在给祖先的祭品中，整只猪要好于半只，半只猪好于猪蹄膀。其实蹄膀本身的象征性含义也很吉利，当地村里有句俗语“没有蹄膀不成宴”。这其中涉及宗教情感和对美食的享受。村民们的上述关于养猪的理由与人们之间宴请或送礼的实践(往来)有相似之处，其背后隐藏着许多准则(礼尚)。因此，在村民们维持关系以及为他们的福利寻求资源时，“养猪”一词暗含着一系列标准，如利益、感情(人的情感)和福气(宗教情感)等。

2. 礼、尚礼与礼尚

我在村里经常看到或听说妇女们带着不同的“礼品”“走人情”或“走人家”的故事，它们都是不同类型的往来^①，如参加婚礼、看望病人，或者为家人在村集体企业中谋取职位等。像养猪一样，在关系的维护和为他们的生活安排资源过程中“交往”的后面也暗含着一套准则，如好处(利益)、感情(人类的情感)、福气(宗教意识)等。村民在礼尚往来实践中的方式方法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总是要考虑如何互相联系或拜访，是否要参加某人的宴席，在别人家要呆多久，在何种场合带什么礼物、多少礼物合适等，这些都是判断关系亲疏的依据。

村民对“礼”，即如何遵从或崇尚(尚礼)“礼”的问题，有一些具体的解释。例如，假设一位客人拜访时带来的礼物质量或数量方面有问题，或者其行为不佳(如迟到、穿着不适宜或对其他客人不礼貌等)，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则这位客人会受到主人家很差的对待。村民告诉我，主人对待客人的这种方式是正确的，原因如下：第一，在道德上这是正确的，它悄无声息地帮助客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主人的失礼。第二，这将提醒主人这段关系是否值得维持。如果这是缘分了结的信号，那么他或她将很高兴看到这段关系的自然终结。第三，安排礼物的过程涉及理性考虑。通常请客的人家会有女性族亲帮忙分类整理主人家所收到的各种礼物，同时她们还要帮忙准备还礼^②。这是劳力支持的一部分，因为无论是整理所收的礼物还是准备还礼，都涉及对当地风俗和礼物接收者关系亲疏的理解。第四，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社会创造的过程。主人还需要根据送礼行为和礼物本身提供的信息，考虑谁想和他(她)接近，谁想和他(她)拉开距离。这事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她)处理关系的策略将要以一种合理

^① Stafford的“来往”可与“往来”互换，即横向的往来，而他的“养”可视为纵向的往来，其解释如孝敬等可视为“礼尚”的一部分。

^② 根据当地风俗，村民不能带着空礼物容器回家。本书的第一部分中详细描述了在每一事件中人们应该带什么礼物、带多少礼物，以及事件结束后应该如何回礼。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的方式运用于未来的场合。令我惊讶的是，几乎我的所有调查对象都乐于对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评头论足，并认为这是一种有意思的事情，也许，他们是在享受他们的创造性工作。

这里“尚礼”与“尚文”或“尚武”的用法在语法上是相通的，但“礼尚”如果单独使用在语法上是说不通的，尽管它构成了“礼尚往来”一词的前半段。在实践中，人们无论对“礼尚”还是“尚礼”在口头和书面上都比较陌生。我在谷歌搜索引擎中分别查到10万和50万以上的这样的用法，意思与我在民间所接触的差不多。而且，使用符合语法的“尚礼”的频次只相当于不符合语法的“礼尚”的五分之一。可以说，“礼尚”和“尚礼”已经开始成为了像“往来”、“来往”那样的可以独立使用的、相互通用的、约定俗成的惯用语。在本书中，我会视不同情境交互使用“礼尚”和“尚礼”。

3. 往来与来往

对江村村民来说，“往来”也叫走往，意思是互相走访，用以描述农户之间的关系状态。村民认为，“往来”是形成和维持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方式^①。他们说，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在村里还是在其他地方，不同类型的关系（亲属、邻居、朋友等）有着不同的关系质量（亲疏好坏）。例如，在ESRC项目调查时大多数村民反映，他们视邻居如亲戚。正如俗语所说的“远亲不如近邻”。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维护好邻里关系涉及大量的责任和义务。村里有一些极端例子，如母亲家和儿子家住得很近，两家人既是亲属又是邻居，非但不能维持好关系，而且到了互不搭理的程度（见第八章周家的例子）。一些有文化的村民引用老子的名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描述这种状况，这句话的原意讲的是邻近两个村庄的情况。然而，两千年来这句话已经有了许多种解释。村民认为，兄弟俩住在同村、甚至两家的房子共用一个院子，却互相从来不来往，这是不合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往来”的丰富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我发现，农民通常用“走动”、“走往”或“走访”等指人们或家庭之间长期的互动关系，而城市居民或有文化的人经常用“往来”或“交往”来指称同样的事。“走动”、“走往”和“走访”中的“走”字意思是走路。这或许是因为在农村社区中人们居住得比较近，“走”是联系彼此仅有的方式，所以“走”在往来中尤其重要。“交往”的“交”也出现在“交通”、“交道”等词语中。这些词语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在城市中出现，并一直沿用至今。在城市里，亲戚和朋友通常住在不同地方，但交通工具会缩短彼此的距离^②。同时，人们还使用一些其他相关的词，如打交道、交往和交情等，但“交际”一词并不经常用。杨中芳和彭泗清（1999）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在建立关系的

^① 在ESRC项目中的“contact, connect”可以理解为“往来”。“每个事件中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各个来源，以及对每个家庭的社会支持都是联系。联系并不是同单个人的，因为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事件中、不同类型的资助中被联系许多次”（Chang 和Feuchtwang, 1996, 第17页）。

^② 在社会主义中国，人们在单位工作，生活在属于单位的大院或大楼里。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会串门，但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同事关系而很少有朋友关系，因为这里存在从单位里竞争同一资源的关系。当然这是另一个议题。

初始阶段经常通过交际或社交来进行。

4. “礼尚往来”与“礼尚—往来”

江村的村民使用“礼尚往来”或“养猪”的说法来形容建立和维持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复杂和创造性的过程。正如Kipnis (1997) 注意到的“不存在不变的、单一的关系形式……每一种关系都包括自己的内涵和社会历史性。诸如‘关系’和‘感情’等词的含义是不固定的”(184)。

然而,复杂的关系或不同类型关系的不确定含义(如关系或人情),可以通过“礼尚—往来”中“礼”的各种原则来加以解释。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以不变应万变”,即任何关系都可能变,而且变化多端,但变化后面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各种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于“礼尚”中的各项原则的变化,也可以通过“礼尚”的原则来加以解释。因而,无论是松散的、暂时的、持久的、做成的或是还在做的不同的关系的形式,都可以根据“礼尚”的原则来判定。在实践中,人们可以选择不同方式在不同关系里进行往来。从第四章到第八章,我将阐述江村村民如何在“往来”实践中根据当地风俗(“礼尚”)以及变动的环境对关系的态度及其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建立在村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上述对“礼尚往来”的理解的基础上,我界定了“礼尚—往来”并以此作为我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礼尚—往来”指的是一种个人互惠关系的创造性过程,不同类型的互惠(往来)可以由不同准则(礼尚)来评判。“礼尚—往来”的生命力来自于享用在不确定情境下不断地平衡各种关系的创造性过程,虽然有时候它会使人获益、有时候会给人带来麻烦。在中国文化中,“礼尚往来”这个词非常古老、复杂而且重要,因此在我的研究中有必要对“礼尚—往来”的使用设定一些限界。第十一章将详细阐述“礼尚往来”的来源及其通常用法,以及我对江村村民使用“礼尚—往来”的理解及其模型的构造。

三、研究方法和范围

尽管前述ESRC项目提供了一个研究指南,但是就如何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社会支持,并涉及“礼尚往来”这个中国社会文化核心问题时,既有的田野作业方法和方法论都显得不够用,而且在一般的方法论教科书中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供借鉴。本节将阐述自己在综合地应用所学的田野方法的过程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研究的田野作业的操作细节(详见第十二章第一、二节),以及如何对每个调查家庭更为深入细致地田野作业,并发展出“后田野作业法”等。然后,再说明自己工作的三个维度:时间、空间和研究者的主观立场。由于后者——多边的立场比较复杂,我将单列出来在本前言的第四部分专门讨论。

(一) 研究方法

1. 一般研究方法

继1995年8月末到11月中旬在甘肃省内官村完成田野作业后,我于1996年2月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中旬到5月中旬又在江苏省的江村开展了田野作业。在田野作业中，我综合地使用了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个案研究等方法，它们与ESRC项目的研究方法相似。当时该项目根据各村的户口登记簿上登记的家庭进行了随机抽样，在江苏省的金星村和江村，根据两个村的人口密度，分别抽出了36户和34户家庭；而在甘肃省的先锋村由于人口稀疏只抽取了24户家庭，而另外7个村庄均抽取了30户家庭。我在内官村和江村的访谈用的都是同样的抽样样本户。但在江村，我仅访谈到了32户，因为其中一户家庭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后来搬到城里和女儿家住在一起了；另外一户是单亲家庭，儿子16岁时离家出走，后来父亲也去世了（见第七章第三节）。

2. 语言

对于从事田野作业的人来说，学会当地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到村里时，只能听懂当地人说话的60%左右的内容。因而，在田野作业初期，我不得不先学会当地语言。在中国，除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方言，例如，江西省的赣语、福建省的闽语，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吴语，广东的粤语，以及覆盖大部分地区的普通话。对于一名能讲普通话的调研者来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展田野作业都将会比较顺利，尽管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地方口音和语调。但调研者在非普通话语言区进行田野作业，尤其是对老年人的访谈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所以需要掌握特殊的语言技能。我学习当地语言的方法是，首先学习县志上的“当地语言规则”，然后在做访谈时注意领会。这些规则大部分与发音有关。而语法规则在中国各地都是相似的。经过几天学习，我能听懂90%的当地语言。内官村的地方话并不太难懂，因为它实际上是普通话的一部分，而江村的语言却属于吴语系。由于我生长在江西，能讲方言中最难听懂的语言之一（赣语），这为我理解中国的不同方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对外来的田野研究者来说，从当地语言中品味出其文化内涵是非常重要的。江村村民总是在不同场合中使用“意思”两个字，例如，不够意思、不好意思、很有意思、小意思、意思意思等等。在明了上述“意思”的不同含义之后，我对村里社会支持如何运作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此类例子通常会发生在以下一些场合，如村民期待受助者回报，或拒绝帮助求助者（即使他们心里是想帮忙的），或延迟报答别人的恩惠，等等。村民用“不好意思”来表达在这些场景中的想法。这与面子有关（见第十章第一节），尽管村民更关心他们的脸面（脸+面子）而不仅仅是脸。我将在第十二章的第一、二节中使用“礼尚—往来”模型进一步说明我是如何进入田野现场以及如何认识访谈对象的。

3. 向导及访谈对象

如何使用当地向导是另一个问题。根据之前的田野作业指南，研究者应该有一名当地村民做向导。那么我的当地向导应该谁？我应该如何使用当地向导？这些问题在我进入田野之前都不十分清楚。对我来说，当地向导与不同的研究者拥有的不同的关系资源有关，他们可以通过不同层次（省、县、镇或村）的人来确认。作为当地向导的村里人，对其角色的最宽泛的理解是，他们可以参与访谈，如有必要还可以充当

翻译,有时候甚至能进一步诠释访谈内容的含义。但是在完成田野作业之后,我认识到,对当地向导抱有如此高的期望是不现实的。村里向导可以是一个人(在内官村),也可以是几个人(在江村)。他们通常是村干部,如在内官村是会计,在江村是农技员和妇女主任。向研究者介绍每个调查家庭的概况、回答关于村庄及自身领域的一般性问题,是他们作为村干部的部分“工作”内容。Bailey认为,当地向导不应该是调查对象或关键角色(Bailey, 1996),因为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如果他们的家庭是调查样本家庭之一,正如江村的情况那样,那么他们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在接受问卷调查后,对研究本身有更多理解,并能提供更多的相关细节信息,等等。所以,他们可能是关键角色人,但随机性抽样导致这种几率非常小。如果当地向导是当地风俗或知识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们也可能是关键角色人;如果当地向导是村干部,那他们的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不同项目的性质。谁能充当村里的关键角色人将取决于不同的研究主题,而且掘出这一类人需要通过访谈所有调查家庭并与相当多的当地人进行交谈。

如何认识回答者、访谈对象或关键角色人是另一个问题。在田野作业中,我使用了与ESRC项目田野作业相同的研究指南和问卷表。问卷融合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要素,由111个问题组成(包括封闭性和开放性问题)。访谈对象也可能是关键角色人,正如我在上一段所讲到的,即,他能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却不必通过填写问卷。我倾向于不使用“关键角色人”一词,因为有太多的人参与到我的田野作业中,而他们在不同方面都可能起“关键”的作用。我将用“访谈对象”一词指称那些回答问卷或额外问题的人,不过我也会在描述田野作业中交代每个人的角色。“被访者”是一个最宽泛的词语,它可以指称回答我任何问题的人,而不管他们是否填写了问卷,或是提供信息的多少。在原先的ESRC项目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把一份长问卷分为好几部分来填完或访完,我也这样做了。然而,我发现,同一家庭中的同一访谈对象在不同受访场合对同一问题会提供不同的答案。当我向访谈对象了解其中详细原因时,我发现他会在不同场合提供不同的解释。按先前的研究要求,每户访问一位18岁以上家庭成员即可,但是,我发现一个家庭中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被访者,所以我的访谈尽量照顾到家庭的各个成员类别: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和青年人。当我询问一位男性访谈对象关于劳力互助情况时,他建议我向他的妻子去了解详细内容。如果我忽视了这位男性访谈对象把我问的几个问题都归结为年度事件中的话,那么年度事件这一分类可能就会被忽略,因为它最初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问卷中。访谈女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年度生活事件都涉及妇女之间的劳动互助。后来当我向调查样本户的女性访谈对象询问同样的问题时,她们会很自然地罗列出上述事件(见第七章第一节)。这使我认识到,用相同的问卷访问不同性别的访谈对象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而这也应该在一般田野作业方法中有所考虑。

4. 问卷

如果用标准的社会学问卷来衡量,这份ESRC项目的问卷显然太长,而且开放性问题过多,因为它融合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问题,如果用标准的人类学问卷来衡量,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

这份问卷也太长，而且问题又过于简单。我发现，这份问卷实际上并不太适用于深入地研究中国农民如何安排他们的社会支持。

为了得到更丰富的信息，我增加了一些问题。与先前的只向访谈对象询问两类主要支持事件不同，我从每户家庭中获取了从1979年到1996年全部的与社会支持有关事件的信息，包括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财力、劳力和信息）、支持的不同来源（自助、他助或公助）以及不同类型的事件（重大家事、突发事件和投资）。我也获得了每个样本家庭的所有的亲属网络结构信息。另外，我还从各类组织、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的不同部门那里获得了大量关于社会支持的文献资料。

我的观察比先前的ESRC项目的田野作业更宽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了解社会支持如何运作，我参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丧事、婚礼和其他重要事件。我在一些重要节日期间和当地人呆在一起，如在内官村参加了国庆节和中秋节，在江村参加了春节、元宵和清明节。此外，在江村我还参加了造房仪式过程中的许多宴席。另一方面为了感受社会变迁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村民的生活，我考察了村庄和镇周围的所有寺庙，还有邻村和镇里的寺庙或教堂。我还考察了由私人、村委会以及当地政府办的各类企业和协会等，以了解社会变迁对村里村外等各方面的影响。

5. “后田野作业法”

由于用社会支持为主题词所获得的经验研究资料在锤炼“礼尚—往来”概念时不够用，在实地田野作业以后，我还通过电话和电邮随访我的访谈对象，并称之为“后田野作业法”（1997—2004年）。起初，我通过电话访问作为田野作业的补充，主要是在一些未完成的个案中使用。例如，当1996年我在村里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家庭拥有电话，然而，到2002年9月，超过80%的家庭拥有电话。虽然村里只有少数人会用电邮，但这对于获取一些文献却非常有帮助。同时，通话费用也明显下降，从19p（1998）到2p（2004）^①。而通过电脑网络通话的费用则更低，不过通话的效果并不理想。电话和电脑的录音功能有助于保存所有的相关信息。最后，如果通信技术成熟到能够识别声音并转换成文字，那么整理这些访谈材料将更容易、更快捷。如果本书中的有关叙述发生在我的田野作业之后，那么这些信息主要来自电话访问。

随着时间的流逝，电邮交流对我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了。电邮不仅可以传送文本、表格，还能传送数码照片。技术发展得越来越迅速，这使得研究者能够将它们运用于田野作业和后田野作业。

^① 不过，电信价格有时会受到中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例如，中国政府突然采取措施，从2000年11月1日开始上调了终端收费，通讯2000每分钟话费从5p上调至15p，卫星通话从10p上调到19p，VoizFone从7美分上调至22美分。在受到海外华人和外国商人的投诉抱怨之后，从2003年初开始，所有相关的通话价格下调，其中打到中国最便宜的价格是每分钟2p，不过这要通过电信折扣并呼18866。作者于2009年校对时补注：以上内容是在2004年写的，自那以后，作者一直是采取这种方式与村民保持联系。所不同的是，由于通信技术的提高，前面所介绍的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一种更为方便和简捷的电话服务来自：www.webcalldirect.com。将免费软件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上（不装也能在网上直接打），无论是在英国往中国打还是相反、往手机还是座机打、用电脑话筒还是座机话筒，无论打多长时间包括接线和话费，每分钟都不会超过一角钱人民币。